

論 点 摘 編

习近平关于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

杨伟民在《学习论坛》2023年第1期撰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对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作出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要论述体现出重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特点,要求构建以传染病“防控一体化”为运行模式、以公共卫生保障体系为基础支撑、以公共卫生源头治理为方策略的特色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要论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根本动力,为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卫生体系提供了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巫者、歌者与辩者:中国阐释学的早期空间及历史嬗变

刘成纪在《江海学刊》2023年第1期撰文指出,现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与一般性的“以西格中”不同,它在当代的本土化过程直接促成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近十年来“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等命题的提出就是证明。单就公共阐释所标举的公共性看,它与中国传统国家空间观念的建构高度匹配。以此为视角介入中国阐释史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早期以“河洛—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是中国人理解和阐释世界的基本场域,也构成了中国阐释学史的前识性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从巫者、歌者到辩者的嬗变,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国先秦阐释主题迁移的过程。据此,公共阐释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展现出鲜明的历史品格;一种基于公共阐释的中国阐释史写作,也在它的源头处清晰起来。

平台反垄断的中国抉择:强化反垄断法抑或引入行业规制?

侯利阳在《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1期撰文指出,自中央在平台经济领域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来,我国的执法部门与立法部门一直以强化反垄断法的路径予以回应。但欧盟2022年10月12日颁布的《数字市场法》为平台反垄断提供了行业规制的新路径。此刻我国面临着是否要在平台经济领域引入行业规制的重大抉择。反垄断法擅长处理策略性市场失灵,行业规制适宜解决结构性市场失灵。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现状表明该领域缺乏稳定的结构性市场失灵,平台多以策略性市场进入障碍来促成垄断。鉴此,近期不宜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立即引入行业规制,但可继续强化反垄断法来实现平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构建高校良好政治生态:时代要求、现实阻碍及推进路径

朱红建、冯留建等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撰文指出,高校政治生态建设是高等教育领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举措。构建高校良好政治生态既是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治保证,也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新时代构建良好高校政治生态,要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前提,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抓高校教师“绝大多数”、抓青年学生“全员系数”;以培育廉洁文化为重要基础,聚焦问题、突出常态、覆盖全面,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严格执行、健全约束、规范监督,扎紧“不能腐”的笼子,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以推进综合治理改革为关键突破,完善高等教育

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建设,强化综合改革实效;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切实推动高校良好政治生态的构建稳步向前。

东固根据地与毛泽东下山开创井冈山道路新局面

蒋建农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撰文指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西南和闽西,这是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组建中央红军的重要步骤,是农村包围城市总战略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其开创井冈山革命道路的新篇章。东固革命根据地不仅为下山初期身处困境的朱毛红军提供了宝贵的休养生息之地,而且以其鲜活的斗争经验,在红色武装割据的方式、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布局等方面,给予毛泽东以重要的启示,对红色政权理论的发展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初步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

郝铁川在《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2期撰文指出,世界上自下而上的内生型和由外而内的移植型两种法治现代化模式均不适用于中国,前者在中国因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断,后者因其结果导致中国沦为西方附庸国而不能被中国所接受。党的十八大以来创造的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式,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国须有人事组织保证的要求,是率先建成法治政府目标的要求,是提高我国司法公信力的要求,是法治重在约束执政权普遍规律的要求。实践已经证明,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有效,主要表现为:中共中央成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很好地发挥了总设计师、总规划师、总指挥、总工程师和总监理师的作用;按照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执政原则,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贯通了执纪和执法,使执政者保持廉洁公正;通过建立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带动我国法治各个领域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来的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政党驱动法治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认真研究中国政党驱动型法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丰富发展人类社会的法治理论,是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深入把握资本规律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由之路

余金成在《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撰文指出,资本现象存在于人类文明史中一个特定时代,是人类在“独立性”时期的基本发展方式,承担从“依赖性”向“自由个性”转变的历史使命;资本作为理性外化形态具有两个表达层次,即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后者呈现从个体本位价值观向社会本位价值观转移趋势;社会主义者把握资本规律经历三个认知环节:第一阶段,从资本附着于分工关系这一事实出发,承认资本与劳动一致性,进而承认资本是标志性劳动成果;即视资本为一般生产要素,把按要素分配看作按劳分配的衍生形式,其衍生的逻辑环节是:资本是劳动—资本是强者劳动—资本是强者脑力劳动。第二阶段,从资本附着于竞争机制这一事实出发,承认资本对生产引领性,视资本为第一再生产要素,把发挥资本作用看作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形式。第三阶段,从资本具有二重性这一事实出发,承认资本的历史过渡性,视法治方式为管控资本的第一原则,德治在引领资本健康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与该认识渐次深化同步。

庆元“禁书”对朱学影响之检视

管仁杰在《史学月刊》2023年第2期撰文指出,庆元党禁时期官方“禁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整顿科场文风,被禁书籍基本是以永嘉时文为代表的科举用书以及浸染士子文风的道学支脉语录或文字。在此过程中,虽不免偶涉程朱一派之著述,但更在无意中帮助朱学清除了异己思想势力,朱学是客观上的受益者。《庆元党禁》等史料所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的说法,不论是泛指儒家

经典,还是特指朱熹著述,都不符合事实。目前尚无证据说明朱熹著述在党禁中曾遭毁板,而且党禁期间朱熹依然从事着出版活动。世传有关党禁的材料多出自朱子后学之手,其中关于朱学所受打压的记载不免存在有意无意地夸张与渲染。

列宁对“取消派”破坏党的统一的错误行为的批判及当代价值

王进芬、汪松林等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6期撰文指出,从1908年开始,列宁对“取消派”破坏党的统一的错误行为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围绕促进党的统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具体表现在:批判“取消派”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去”论,强调必须捍卫以马克思主义为共同思想基础的统一;批判“取消派”否定党的革命纲领和策略的错误行为,强调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是实现党的统一的根本要求;批判“取消派”否定党的秘密组织的派别独立活动,强调没有统一的组织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党;批判“取消派”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言行,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

是实现党的行动一致的保证。列宁的这些主张有效地捍卫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资治通鉴》载汉元帝时期史事辨析

李峰、刘嘉诚等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2年下卷撰文指出,《资治通鉴》将元帝立刘骃为太子事系于初元二年四月,将郑朋荐张敞傅辅太子事系于其后;将弘恭病死事系于初元二年十二月萧望之饮鸩自杀之后;将周堪病卒、张猛自杀事,系于永光四年六月日食之后;将匡衡因地震日食之变上疏事,系于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日食之后。然而征诸史实,刘骃被立为太子事应在初元二年正月,郑朋荐张敞傅辅太子事在刘骃被立为太子后至初元二年二月戊午之间;弘恭病死在永光元年夏季至九月二日前;周堪病卒、张猛自杀事,当在永光四年周堪为光禄大夫后至建昭元年五鹿充宗为少府前;匡衡因地震日食之变上疏事,当发生在初元三年六月颁布诏书后至初元五年四月颁布诏书前。

尊重个体的人:国际法视野下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

涂诗万、陈晶莹在《现代教育论丛》2023年第1期撰文指出,国际理解教育中存在“一”与“多”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回到国际理解教育的源头——国际法,就能找到“一”与“多”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可化解它们之间的紧张。在教育目的方面,多项国际法明确规定培养和增进对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的尊重是现代教育应有的目的。从教育内容方面看,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人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全球视野教育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都体现了国际法中尊重个体的人的原则。在教育方法方面,现代教育所倡导的向教师赋权、“学生中心”、自由交流和人道的惩罚都体现了国际法中尊重个体的人的原则。总之,国际理解教育就是要理解国际上共同理解的原则和价值。毫无疑问,国际法正是国际上共同理解的原则和价值的“公约数”。而对每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则是这个“公约数”的核心。真正落实“尊重个体的人”的原则要求我们把自己作为方法,通过构建意义丰富的自治型的小共同体实施教育。

货币政策产业结构效应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分化

谢超峰在《经济体制改革》2023年第1期撰文指出,运用时变量自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非金融类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在宏观上具有产业结构效应,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杠杆率分化,且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长短期杠杆率影响不同。由于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各行业金融摩擦程度不同,货币政策会导致各行业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存在分化。同时,由于信贷歧视程度不同,货币政策调整也会导致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分化。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在实施总量型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需注重去杠杆、稳增长以及调结构之间的关系,更需要政策之间的协调以保证杠杆率处在合理区间。

从传统到现代:再造生态美学的本土化经验及实践转向

温馨、刘科等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3年第1期撰文指出,作为一种价值存在,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必须在历史的进程中汲取本土化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挖掘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资源,从实践中获取生态美学的发展动力。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美学越来越多地把人化自然纳入学科关注视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审美原则。在生态学和美学的结合和相互作用下,生态美学展现出具有现代性与国际化的审美观念与价值追求。在新时代,生态美学研究有助于美化个人生活,提升审美水平,促进人们主观美的感受与客观生态美的有机统一。再造生态美学必须结合现实国情,突显人民性的道德品格、可行性的实践品格和应用性的生活品格,使之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新的生态美学让人们更加自觉地追求生态之美,用审美的眼光关注生活实践和生活环境,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审美基础。

新安全格局: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引领下的新型毒品犯罪治理

陈永峰、张艾嘉等在《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撰文指出,党的二十大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现实,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国家安全观,并要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法治是保安全、促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善治的核心。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表现。新型毒品犯罪治理牵涉人身财产保护、互联网犯罪以及跨国犯罪等多个安全领域,需要进一步实现路径优化。面对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和挑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汲取营养,不断优化治理路径,从而为新安全格局的构建扫清障碍。

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研究

梁超、张荣华等在《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整

体性认识。其中,明确提出关于党的领导的“四个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六个必须坚持”、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三个务必”、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等重要论述,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明确提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全面依法治国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等重要论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明确提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要论述,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些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集中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拓展,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大数据时代人格权财产化利用研究

赵一萌、于庆生等在《南都学坛》2023年第1期撰文指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人格权的财产化利用渐趋成为人格权立法中的重要议题,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关于数字人格权的利用机理和保护路径存在较大差异。然而,现行《民法典》体系下的人格权并没有实现完整意义上的规定。其根本缺憾在于:缺少从外部视角去探索人格权的全部内涵。具体体现为:人格权立法定位不准确、人格利益数字属性受限、权利保护层次单薄。究其根源,在于尚未厘清人格层次的逻辑性,视野局限于人格的身份利益,使得权益开放性的另一面——财产利益无法得到法律关照。同时需要关注,在人们的身份、行为、关系通过数据进行具象展现的时代,数字素养是人格所需的必备素养,在关照人格权的财产利益时,应重视其数字属性。厘清数字人格权的内生逻辑还需做到:法理观念上补阙人格的逻辑层次,规范适用上软化人格权的专属性,制度构造上型塑多重权利保护标准,方可从本源上划清数字人格权中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边界,从而使民事主体享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人格权。